

引文格式: 苏德金, 陈浙英. 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视角下的国际创业研究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 (3): 69-77.

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视角下的国际创业研究

苏德金, 陈浙英

摘要: 高质量的国际创业已经成为中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抢占价值链有利位置的战略举措。然而, 国际创业活动面临着“外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劣势”的双重威胁, 影响创业成功率与成长性。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演绎研究发现, 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有助于突破“外来者劣势”约束, 产业网络嵌入有利于降低“新进入者劣势”威胁, 可见, 不断深化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程度是国际新创企业成功的关键。因此, 国际新创企业应当主动熟悉东道国当地社会环境, 积极嵌入东道国当地产业链分工, 消除东道国社会网络偏离与东道国产业网络偏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政府主管部门应对照已经实施的国际创业支持政策, 为国际新创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更具微观基础的扶持措施。

关键词: 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 国际创业; 外来者劣势; 新进入者劣势

作者简介: 苏德金, 管理学博士, 南京审计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陈浙英, 南京审计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双劣势约束下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组织即兴能力对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719721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母国网络位置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 外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71602090);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对国际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KYCX20_1699)。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3.007

在2020年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 要积极开展国际创业, 推动跨国经营, 增强经济、贸易、技术等层面的国际间合作, 拓宽对外开放的宽度与深度, 进而优化经济产业结构, 提升中资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欧美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较大力度的减税政策, 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 吸引中高端制造业向本国回流(特朗普“新政”、“再工业化”、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 并对中国一些产业领域进行技术封锁, 以重塑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内部战略的需求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迫使中资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协作与竞争中, 吸收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性资源, 以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强化技术创新能力, 获取战略竞争优势。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 我国的国际创业活动呈现出持续的活跃态势, 数量庞

大的国际新创企业相继出现,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与投资活动也日益紧密,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1-2]。然而,我国的国际创业活动面临两大困境:第一,国际新创企业经常性遭遇投资冲动、资源错配、产业偏离、厂址选择失误、远离核心客户群、缺乏战略竞争力等问题,导致国际新创企业无法融入当地市场环境。第二,创业对象国的市场机制、产业制度、社会环境、政治法律等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国际新创企业经常性地遭遇水土不服、关系难以协调、饱受东道国歧视的困境。换言之,国际新创企业要抢占并立足于国际市场,首先要解决适应当地社会环境、融入当地产业链的问题,即突破东道国社会网络偏离——“外来者劣势”(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与东道国产业网络偏离——“新进入者劣势”(the liability of newness)的约束。因此,在“走出去”力度加大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的现实情境下,有针对性地研究如何突破双劣势约束、促进国际新创企业的创立与成长,具有重要的时代紧迫性与理论必要性。

运用网络嵌入分析方法揭示新创企业的创立与成长路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业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趋势^[3-5]。新创企业“需要通过嵌入社会网络获得社会资源支持,嵌入产业网络获得产业链分工协作收益”,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统称“双重网络”)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新创企业的创业网络^[6-8]。网络有助于创业者识别和利用初始的国际创业机会,网络嵌入是选择目标市场和进入模式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因此,有效地嵌入东道国双重网络(dual networks of host country)、提高网络嵌入程度与绩效,将有助于提高国际新创企业的成功率与成长性。具体而言,第一,国际新创企业要主动适应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自然环境、文化习俗、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在东道国构建较为稳定、持续的社会网络,以获得国际创业所需的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支持,降低当地社会资源获取成本,克服“外来者劣势”的不利影响;第二,国际新创企业要积极参与东道国的产业分工协作,与当地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等形成互信、互惠、互利的合作竞争关系,融入东道国的产业网络,获得产业资源与分工效益,弱化“新进入者劣势”的消极作用^[9]。因此,有必要对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的国际创业理论渊源、演化过程与现实意义进行剖析,以期为提升国际创业成功率与成长性提供管理启示。

一、基于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的国际创业分析

(一) 全球化情境下的国际创业: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研究的兴起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网络的概念被引入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学者们纷纷从网络的密度、节点、强度、开放性、结构性等角度探讨其重要性^[10-11]。网络嵌入视角下的创业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围绕社会网络、产业网络、创新网络等角度考察网络嵌入与新企业创立、成长之间的关系展开^[12-13],并出现了解释新企业创立的“网络创立假说”(the network founding hypothesis)与新企业成功的“网络成功假说”(the network success hypothesis)两种观点^[14-15]。“网络创立假说”认为,创业者要通过嵌入所在的社会网络搜集市场信息、资金渠道等创业资源,抓住竞争环境下转瞬即逝的创业机会,进而服务于创意的产生、项目的孵化、创业的筹备、企业的设立等;而“网络成功假说”则认为,创业者要通过创业网络嵌入扩大新创企业的资源渠道,丰富企业的资源基础,降低企业的资源获取成本,培育瞬间竞争情境下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促进新创企业的成

长、成功^[13,16]。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天生全球化企业 (born global firms) 的出现,国际间的知识学习、技术转移、能力复制、产业链协作等成了国际创业活动所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17],创业网络嵌入也被引入国际创业研究之中。学者们主要从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对国际新创企业创立和成长的影响两个方面,揭示东道国创业网络在国际创业中的作用。简言之,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分析方法将国际创业研究置于全球化情境下,有效地拓展了创业研究的宽度与深度。从东道国创业网络的构成来看,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可以分为突破“外来者劣势”约束的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与突破“新进入者劣势”约束的东道国产业网络嵌入,前者是社会经济网络理论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network theory) 关注的中心,后者是产业组织理论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研究的领域。

(二) 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经济网络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创业成长研究

社会经济网络理论认为,经济活动被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程度、演化规律等特征对经济活动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在陌生的东道国环境中,社会资源存在复杂的连带关系,国际新创企业无法单纯依靠转让、购买等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所需的一切创业资源。然而,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程度影响国际新创企业的存活率与成长性。第一,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关系属性,有助于构建资源的获取途径,且其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大、成本较为低廉^[18-19]。社会网络的积累、强度、数量、稳定等特征有助于搜集东道国市场信息、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性、规避政治风险,进而提高在东道国当地创业的成功率^[20]。第二,国际新创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网络往往是伴随着创业过程而不断拓展、演化、巩固的。良好的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程度与绩效,将有助于国际新创企业整合当地网络资源,利用网络成员对其的信任关系,获得当地合法性认可,吸引更多的资源提供者,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东道国政府对于国际新创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猜忌,突破可能存在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进而降低网络嵌入成本。

换言之,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为国际新创企业提供了与东道国社会网络成员相互沟通、交换相关信息、构建良好关系的桥梁。东道国社会网络中分散着企业创立与成长所需的各种社会资源,国际新创企业需要通过提高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的程度与绩效,获得网络成员的信任,才能够打通资源获取渠道^[21-22]。为了揭示东道国社会网络对国际创业的内在逻辑,学者们开始利用数学与网络分析工具,通过理论与实证的方法展开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东道国社会网络的含义及其构成要素与国际创业的逻辑演绎关系;第二,东道国社会网络的层次结构与国际创业的影响框架;第三,东道国社会网络的运行机制对国际创业的影响;第四,东道国社会网络的动态演化规律对国际创业的影响等等。例如,Cavusgil 等^[17]研究认为,国际新创企业可以选择母国移民较多的地区作为创业(出口或直接投资)目的地,循序渐进地开展业务,避免盲目投资或选择失误带来的社会网络偏离问题,提高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的程度与绩效。

总而言之,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的核心观点是:国际新创企业被嵌入东道国社会网络中,当地的法律、经济条件、人际关系、文化习俗、信息共享、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其获取具有东道国特征的社会资源的可能性,进而制约国际创业的成功率与成长性。因此,为了克服这些限制,国际新创企业必须提高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的程度与绩效,建立稳定的社会网络联系,获得当地的“合法性”认可,淡化“异国色彩”,突破“外来者劣势”的束缚。

(三) 东道国产业网络嵌入：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创业成长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市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与产业的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边界，多采用“结构-行为-绩效”三分法对产业进行分析。随着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战略联盟、创新网络、外包联盟、产业集群、工业园区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相继出现。上游企业、下游企业、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与企业自身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相对稳定的产业网络(industrial networks)，对企业的创立与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换言之，产业组织理论将企业的创立与成长纳入一个产业生态系统中，认为企业是嵌入其所在产业网络中的，一群彼此依赖的组织在产业内从事分工、沟通、协作、竞争等活动，离开所在的产业网络将难以获得所需的原材料、顾客市场与合作机会^[23-24]。例如，Stam等^[25]通过对软件行业90家新创企业进行研究发现，产业网络嵌入程度越高，与产业内外组织的联系与互动越强，进而增加获得分工收益的可能性、提高企业的成长性。

国际创业同样存在甚至更须重视东道国产业网络的嵌入质量，因为东道国市场的陌生感将会增加跨国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为了事先感知与应对这些不确定性风险，国际创业企业就应该主动搜寻东道国的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并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换，即参与东道国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嵌入东道国的产业网络。东道国产业网络嵌入不仅可以增强新创企业对当地产业环境的适应力和经营活动的灵活性，而且能通过产业网络嵌入获得顾客、供应商、协作企业、竞争企业、潜在进入者等的信息或资源，突破“新进入者劣势”约束，获取产业分工效益。Andersson等^[26]通过调查97家国际新创企业发现，与东道国的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稳固的、互动的产业网络关系，将有助于提高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自主性和灵活性。Zhang等^[27]通过分析美国投资中国的风险公司的相关数据发现，企业如果在东道国产业网络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network centrality)，将提高企业在当地的行业吸引力(attractiveness)，强化当地企业与之合作的意愿(willingness)。

总而言之，东道国产业网络的嵌入质量及效果是推动国际新创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国际新创企业为了进行创新活动、准确预见东道国市场潜力、尽可能降低商业风险，就必须主动地嵌入东道国的产业网络，并不断地更新、扩大、巩固产业网络关系，以保证能够通过东道国的产业网络搜索与获取具有东道国特征的行业资源、机会，克服“新进入者”劣势，增强产品或服务获得东道国消费者青睐的可能性^[28]。

二、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的动态演化对国际创业的影响

国际创业需要提高东道国双重网络的嵌入质量并增强嵌入程度，构建更为健全、高效的创业网络体系，这是国际新创企业突破“外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劣势”约束、成功立足于东道国市场、提升国际创业的成功率与成长性的关键。

为什么一些国际新创企业能够实现持续的成长，而另一些却快速地走向死亡？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认为，资源是推动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基石，尤其那些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获取先行者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的关键，即“资源-能力-绩效”之间的传导效应要求企业必须不断地丰富、更新组织的资源基础^[29]。然而，新创企业由于受限于“新进入者劣势”，如何获取、利用、整合内外部资源以提升企业能力，确保企业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与行动，是亟须解决的关键性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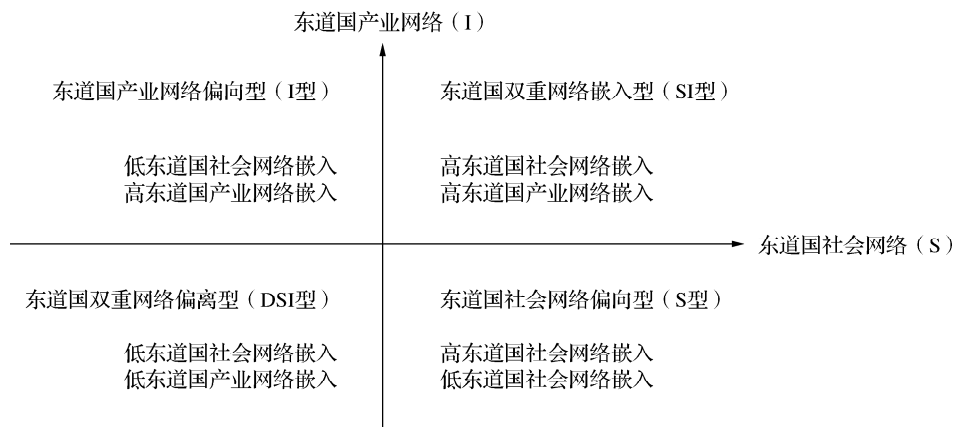
题。在创业网络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新创企业、顾客、供应商、风险资本提供者等)处于不同的节点、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了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网络结构,进而影响网络中各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与获取资源的可能性^[30]。网络嵌入理论认为,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嵌入创业网络,更快地建立合法性与获得资源支持,丰富创业资源禀赋,进而为发展各种企业能力层次(如零阶的运营能力、一阶的动态能力与高阶的即兴能力)提供可能。

一般而言,网络嵌入的类型有两种: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与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6, 11]。结构性嵌入将网络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密度、中心度三个维度,重点关注网络结构的要素与特征;关系性嵌入是以利益主体间直接联结为纽带的二元交易关系,基于关系强弱程度(“强关系”与“弱关系”)考察网络作用,强调网络中各关系节点的主体关系强度,一般从互动、互信、互惠、承诺等信任或情感角度衡量关系性嵌入程度。已有实证研究都证明关系性嵌入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大量存在于组织外部的新技术、新知识、新机会,进而影响技术创新与初始绩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部分学者认为弱连接更有利于获取外部差异性资源,避免资源同质化^[6];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强连接意味着更高的互动互信,更有可能从网络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夯实企业资源基础。对于国际新创企业而言,“外来者劣势”容易导致当地网络偏离,加强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更快地建立合法性,获取网络成员的信任,进而嵌入东道国产业链分工之中获取分工收益。因此,国际新创企业要通过强化网络关系性嵌入程度,在与外部资源持有者互动的过程中建立利益共同体,进而获取或整合更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提升企业能力^[31]。换言之,关系性嵌入拓宽了国际新创企业获取稀缺性资源的途径,为获取那些可以培养企业战略思维与决策柔性的创新性资源提供了可能。

基于以上分析,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对国际新创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双劣势约束下提高国际创业成功率,增强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性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3]。因此,结合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研究,将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分为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与东道国产业网络嵌入,并认为双重网络存在动态演化关系,具体包括:东道国双重网络偏离型(DSI型)、东道国社会网络偏向型(S型)、东道国产业网络偏向型(I型)、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型(SI型)。当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程度较低(DSI型)之时,国际新创企业偏离了东道国当地的创业网络,难以准确把握东道国社会文化、消费者偏好等一系列关键性信息,无法获得当地的社会资源与产业资源,必须面对“外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劣势”的双重威胁,在当地构建组织合法性的难度大,创业成长的成功率与成长性极低。东道国社会网络偏向型(S型)代表国际新创企业有效地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地理环境等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弱化了“外来者”色彩,但是东道国产业网络嵌入程度低,与东道国当地的供应商、顾客、企业等交流合作极少,难以参与当地产业链的分工活动,不得不面对“新进入者劣势”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市场开发成本高、行业进入壁垒高。相反地,东道国产业网络偏向型(I型)则意味着国际新创企业嵌入东道国当地产业网络并获得了分工收益,有效地弱化了“新进入者劣势”威胁,但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程度过低,必然遭受“外来者劣势”约束。只有同时嵌入东道国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SI型),国际新创企业才能在东道国获得创业成长所需的社会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防止资源错配、增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国际创业的成功率,增强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性。

如图1所示,从东道国双重网络偏离到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反映了国际新创企业在东道国创业网络的动态强化过程,是能获得具有当地特征创业资源、更快建立组织的合法性、突破“外

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劣势”约束的关键所在。



注：S=东道国社会网络；I=东道国产业网络

图1 国际新创企业的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程度差异示意图

三、讨论与结论

基于网络嵌入性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双重网络嵌入对突破“外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劣势”的关键作用，指出了有效提升国际创业成功率与成长性的网络化战略。

(一) 理论贡献

网络嵌入是连接创业环境与创业资源的重要“桥梁”，影响新创企业的资源基础与能力内涵^[20]。基于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的分析，有助于揭示既有国际化特性又有创业特性的国际创业成长机制。运用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基于关系性嵌入视角，将东道国创业网络嵌入分为社会网络嵌入与产业网络嵌入，探讨了国际新创企业如何嵌入东道国双重网络中。确立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的量化衡量指标，构建东道国创业网络分析体系，将有助于国际新创企业寻求东道国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偏离的解决对策，完善创业网络理论框架，丰富和发展国际创业理论的研究领域与视角。

(二) 管理启示

1. 为国际新创企业主体提供实践框架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走出去”力度加大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情境，研究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与国际创业绩效的逻辑关系，对解释我国的国际创业行为与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国际新创企业而言，首先要解决如何适应当地社会环境、融入当地产业链的问题，即突破东道国社会网络偏离——“外来者劣势”与东道国产业网络偏离——“新进入者劣势”约束。东道国双重网络的嵌入，不仅能够有效突破双劣势（“外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劣势”）束缚，而且有助于构建包含运营能力、动态能力、即兴能力在内的层级体系，提升国际创业突发风险的应对水平，降低跨国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创业的成功率，增强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性。

2. 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与依据

近年来，我国创业热情不断高涨，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各种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有效地激发了经济活力，释放了巨大创造力^[32]。在“走出去”力度加大的背景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能局限于本土视野，还应该开展国际创业，提升中资企业在全

链分工中的作用^[19]。通过对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与国际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提出,东道国社会网络嵌入与东道国产业网络嵌入有助于解决国际创业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与“新进入者劣势”,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凝练实践启示并对照已经实施的国际创业政策,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具有前瞻性、具有微观基础的创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保证相关决策具有理论基础与数据经验支撑。

3. 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国际创业”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在东道国网络嵌入与国际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无疑为双劣势约束下的国际新创企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支撑。但就目前的文献而言,无论是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双劣势约束克服等的独立研究,还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探讨都较为散乱,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和系统的理论体系,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第一,研究理论上,学者们多从单一的网络视角考察国际新创企业的成长机制,忽视了东道国创业网络的双重性,无法回答如何突破双劣势约束,影响了理论的说服力。因此,有必要剖析东道国创业网络的双重性,并探讨其对国际创业活动的作用路径^[33-35]。

第二,尚未有效揭示情境因素对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虽然研究者强调了情境因素对国际创业成长的重要性,但尚未揭示情境因素对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与国际创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机理^[36-39]。因此,有必要分析个体、组织、环境等因素对东道国双重网络嵌入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以丰富国际创业的理论基础、强化理论研究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 [1] 黄胜,刘洋,丁振阔. 如何动态把握国际机会以提升国际创业绩效 [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 (10): 1817-1827.
- [2] 王泽宇,刘刚,梁晗.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选择的多样性及其绩效评价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3): 5-23.
- [3] 蔡莉,单标安.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 回顾与展望 [J]. 管理世界, 2013 (12): 160-169.
- [4] 谭云清,马永生. OFDI企业双元网络与双元创新: 跨界搜索的调节效应 [J]. 科研管理, 2020, 41 (9): 170-177.
- [5] TERJESEN S, HESSELS J, LI D.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42 (1): 299-344.
- [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3): 481-510.
- [7] PATEL P C, CONKLIN B. The balancing act: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habitu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alancing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33 (5): 1045-1078.
- [8] 庄晋财,沙开庆,程李梅,等. 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规律研究: 以正泰集团和温氏集团为例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8): 122-134.
- [9] SEDZINIAUSKIENE R, SEKLIUCKIENE J, ZUCHELLA A. Networks'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9, 59 (5): 779-823.
- [10] 孙博,刘善仕,葛淳棉,等. 社会网络嵌入视角下人才流动对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研究 [J]. 管理学报, 2020, 17 (12): 1760-1768.
- [11] MUSTEEN M, DATTA D K, BUTTS M M. Do international networks and foreign market knowledge facilitate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 (4): 749-774.
- [12] 李新春,叶文平,朱沅.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 (1): 基于 GEM 数据的跨国 (地区) 比较研究 [J]. 管理科学学报, 2017, 20 (8): 112-126.
- [13] BARALDI E, CIABUSCHI F, LINDAHL O, et al. A network perspective on the reshoring process: the relevance of the

- home and the host country contexts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8, 70: 156-166.
- [14] DENG Z L, JEAN R J, SINKOVICS R R. Rapi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acro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 (8): 1010-1032.
- [15] HOANG H, ANTONCIC B.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 (2): 165-187.
- [16] CAO L L, NAVARE J, JIN Z Q.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ow the international retailers rebuild their core business logic in a new host country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8, 27 (3): 543-562.
- [17] CAVUSGIL S T, KNIGHT G. The born global firm: an entrepreneurial and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on early and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5, 46 (1): 3-16.
- [18] 蔡莉, 鲁喜凤, 单标安, 等. 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能够相互转化吗?: 基于多主体视角的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8, 34 (12): 81-94.
- [19] 孟醒. 企业对外投资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闻风而动还是谋定而后动?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 (5): 69-82.
- [20] STOYANOV S. Enabling social identity interaction: Bulgarian migrant entrepreneurs building embeddedness into a transnational network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29 (2): 373-388.
- [21] 刘晓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东道国因素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的共同考察 [J]. *经济经纬*, 2018, 35 (3): 59-66.
- [22] ZAHRA S A, NEWELL L R, LI Y. On the frontiers: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or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 (1): 137-158.
- [23] 赵云辉, 陶克涛, 李亚慧, 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 QCA 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1): 118-136.
- [24] SPIGEL B. The relational organiz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 (1): 49-72.
- [25] STAM W, ELFRING 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ra-and extra-industry social capital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51 (1): 97-111.
- [26] ANDERSSON U, FORSGREN M, HOLM U. The strategic impact of external network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 (11): 979-996.
- [27] ZHANG J, PEZESHKAN A. Host country network,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6, 51 (2): 264-277.
- [28] 尹美群, 盛磊, 吴博.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 (1): 81-92.
- [29] 李梅, 余天骄. 研发国际化和母公司创新绩效: 文献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 [J]. *管理评论*, 2020, 32 (10): 106-119.
- [30] 王军, 曹光明, 江若尘. 组织即兴的形成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和组织学习理论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 (2): 33-48.
- [31] 马鸿佳, 吴娟, 郎春婷. 新创企业即兴行为到惯例的形成机理: 基于创业学习视角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40 (11): 116-128.
- [32] 李伟明, 杨叶凡, 毛良虎. 基于熵值法和差异驱动的企业家精神动态评价研究: 以长三角新创企业为例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 (3): 47-54.
- [33] MATA J, ALVES C. The survival of firms founded by immigrant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home and host country, and experience in the host countr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 (11): 2965-2991.
- [34] REUBER A R, KNIGHT G A, LIESCH P W, et al.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pursuit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 (4): 395-406.
- [35] 田毕飞, 戴露露. 基于跨境电商的中国新创企业国际创业路径 [J]. *科研管理*, 2019, 40 (9): 149-158.
- [36] CORE J E, HOLTHAUSEN R W, LARCKER D F. Conforming to the host country versus being distinct to our home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19, 25 (5): 919-935.
- [37] 丁一兵, 刘紫薇. 中国人力资本的全球流动与企业“走出去”微观绩效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3): 119-136.
- [38] 刘业鑫, 吴伟伟. 技术管理能力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环境动荡性与竞争敌对性的联合调节效应 [J]. *科技进步*

与对策, 2021, 38 (7): 10-18.

[39] 薛佳慧, 彭华涛. 创新投入、国际人才流动与国际创业: 基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实证研究 [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 (2): 133-140.

O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Host Countries

Su Dejin, Chen Zheyang

Abstract: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ov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the labor divis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seize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it. However,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faces dual liabilities of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nd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which impacts the success rate and survival rate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host countries is beneficial to overcome the constraint of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nd industr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is beneficial to decrease the threat of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The constant deepening of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host countries is key to the success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In this regard,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ies, actively engage in the labor division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chain of host countries, and eliminate negative influence brought by social network deviation and industrial network deviation from host countries. Government authority should refer to the exiting supportive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 more targeted and microscopic supportive measures for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Keywords: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host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收稿日期: 2022-01-10; 责任编辑: 沈秀)